

## 在效率、韌力與公平之間尋回平衡：放任資本主義需大重整

何順文

過去二十多年，特別是兩次金融危機，人們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自由貿易及企業責任的憂慮和批評一直增加，已引起全球的廣泛關注。新冠疫情令更多人思考這場災難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衝擊，也讓我們看到了西方金融制度與近代企業管治的諸多病徵。

在 2020 年前多國的經濟環境狀況已不理想（全球增長降至 2.5%，負債佔 GDP 比率增長 33 倍），很多政府和企業根本無法償還債務。表面的興旺只顯示出資本主義經濟泡沫的不切實際。系統性危機早已存在多年，但新冠疫情促使我們有更急切性去檢視資本主義體制及其所引起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把將出現的經濟危機只歸咎於新冠疫情。

誠然，資本主義實際上並不代表自由公平市場競爭，因為市場總是不完善或會失靈的。多位歐美學者如布羅岱爾(Braudel)、華勒斯坦(Wallerstein)及赫爾曼(Hermann)，均先後指出資本主義有無限彈性作自我延續，它主要促進資本流通與不斷積累集中、對財團傾斜、製造更多壟斷，是個「勝者全取」的不公平遊戲。過多的累積資本轉作投機性的投資，而非用在製造生產，結果容易造成資產泡沫爆破，拖慢經濟及中下層的收入增長。

### **新自由主義的後遺症**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多國都採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以重建經濟。凱恩斯主義因重視維持全民就業及提供一個較完整的福利系統，令經濟體往往出現赤字。到 70 年代，赤字預算及經濟停滯成為普遍問題。之後自由化、放鬆市場管制和私有化變成新常態，特別在英國戴卓爾夫人政府及美國列根政府領導下，凱恩斯主義已漸退色。

反對政府干預自由市場，並提倡競爭與小政府理念，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成為發展中經濟體的主要管治哲學。這時候 IMF、世界銀行等環球組織以至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如佛利民，都視市場自由化為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新自由主義引發的問題不單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造成經濟萎縮或更多社會不公，歐美國家在 08 年金融風暴後也發現自己水深火熱。這個危機顯示經濟金融化及不斷無限增長是不切實際的。

另外，每次危機後多國大幅增加貨幣供應，巨額資金流入市場，不但承托了資產價格，流動性增加讓擁有資產的人可以獲得大份額的新融資，也刺激股市。在渡過難關後，資本在下一輪經濟週期可獲得豐厚利潤。因此，很多人認為所謂「不干預」政策，很多時是為資本利益服務，可以說這場疫情加大了 1%富人和 99%民眾在財富上的鴻溝。疫情後多國將漸步入長期債務週期的末端，隨著零利率政策的推行，傳統刺激經濟方案也將失效。最終導致「百病纏身」的資本主義經濟更難復原。全球早已陷入影響資本再生產能力的「系統性危機」當中。

### **商界企業不能再股東價值至上**

在商界與企業層面，自兩次金融風暴及不少企業醜聞後，佛利民 50 年來的舊主張「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盈利」一直備受挑戰，包括 2011 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過去很多大企業高層的「賺到盡」行為，只顧追求短期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 (maximizing shareholders' value, MSV)，遺忘了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又稱「持份者」，如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及環境）的考慮，令人憂慮商界、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信任會否惡化，亦導致今天美式「股東資本主義」的許多問題。

企業高層追求短線「賺到盡」及壓抑中下層工資成本，而政府亦受制於財團。美國平均家庭的經濟收入增長一直很緩慢，而少數美國富豪的財富則不斷急升，令貧富鴻溝擴大。在美國，億萬富豪的總財富在疫情期間顯著大幅增加。這個不平衡現象已威脅到美式資本主義及其社會結構，也帶來了社會的分化。

北美管理學者馬田(Roger Martin)在其新書 *More is not Better*，指出美式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是人們視經濟為一部複雜機器，不斷追求更高效率和增長為目標。但過分追求效率已不經意地失去平衡，除減弱對危機的適應韌力，原來龐大的中層一直大幅減少。勞工家庭收入中位數增長非常緩慢，令貧富更懸殊。據調查，56%美國人認為資本主義應該大幅改革。

在近年商界及學術界一些先鋒對「股東價值最大化」似是而非的概念已有所反思，建議重新界定企業與社會的關係和推動新的社會契約，即「利益相關者為本」(stakeholder-based)，就是相信企業高層應不只向股東負責，也要向其他主要的利益相關者負責作出平衡，以賺取合理利潤。

在疫情高峰期間，有些企業從危機中「攤著數」謀取暴利，甚至一方面派發股息另一方面急於大幅裁減員工。但也有不少企業自覺地加緊愛護員工、更重視顧客、支援社區、公平對待供應商、愛護環境等。對大部分企業而言，疫情無疑是一次嚴重的衝擊，同時也是一次反思的機會，領悟開啟企業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雙贏之路。

### **資本主義需要大重整**

英國資本主義在 1980 年代起，已滲入了不少社會民主元素，減少惡性競爭、壟斷、剝削工人、長工時等政策，引入各種保障工人權益和社會福利的機制。新時代需要一個能彰顯平等和公義的新類型資本主義制度(如較接近北歐或新加坡模式)。

疫情似乎是一個警號提醒我們要加快改革，切實地走出困局。政府增加的很多臨時舒困措施並不足夠。我們要為社經系統轉化為一複雜具適應性系統，以平衡經濟效率、應變韌力與社會公平。唯有如此社會未來才不會再懼怕危機後對經濟民生所帶來的衝擊。

政府要讓自由市場充份發揮作用之餘，更要化解社經不平等、重構產業政策製造新就業機會、加強控制金融化的風險、避免財團壟斷及作出傾斜、要求企業照顧好非股東持

份者、鞏固綠色可持續環境生態、改革再分配政策，及大幅提升勞工權益及社會保障扶助弱勢。

我們很難指望個別界別能改變整個體系。政府、企業、學界、民間組織與其他利益相關者都要作出轉化、發揮自己的作用，共同建立一個更強韌更抗風險的社經體系，以應付下一次或更多的危機。換言之，我們需對資本主義要作出「新政」(New Deal) 或如世界經濟論壇主席 Schwab 提出的「大重整」(Great Reset)。

一些經濟學家鼓吹不論收入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概念，顛覆了傳統認知。另外，還主張減少工時，以便大眾有更多時間進行社區與創作活動並提升其生活質素。這些挑戰的正是「資本主義 別無他選」的假設。

現今年青人追求收入及財富時，更重視社會公平、公義、包容及可持續性。「大重整」計劃要引導自由市場走向這個未來，以構建一個「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校長/教授

(按：此文根據作者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恒大校長 X <亞洲週刊>總編論壇」上的發表作修訂。內容只代表個人意見)

24-12-2020